

壹、緒論

臺灣的大學入學制度經重大改革，以多元入學方案取代一試定終身的聯考制度，但改革後仍未能解決補習班盛行、教育的城鄉差距、學生越區就學、高中教育未正常化等老問題，令人質疑大專院校的招生是否能兼顧卓越與公平（彭森明，2006）。社會大眾與學者最關心的大學教育問題，在於不同背景者是否都有相同機會接受大學教育，而符合機會均等原則？這個問題在臺灣社會無論多元入學方案實施之前與後，結果都大致相同：家庭社經地位愈高者，大學入學機會愈高。曾天韻（2004）根據中央研究院1997年「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進行邏輯迴歸分析，發現父親的職業與教育程度愈高、母親的教育程度愈高者，大學就學率與升學率愈高；出身背景對個人教育機會的影響隨升學層級提高而下降。自2001年實施大學入學多元方案後，升學機會與社經背景的緊密關聯依然沒有改變。陳正昌（2005）分析臺灣高等教育資料庫發現，大學入學機會仍不均等，個人社會階層背景最高者，就讀公立大學機會也最高。

在傳統的聯考制度下，由於入學機會僅與學業成就表現直接相關，因此過去總聚焦於二者關係，學生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的正相關已有相當多研究基礎；但研究也發現，二者關聯並非絕對，學業成就還是可經由個人努力達成。江俊儀（2003）調查臺北縣公、私立高中職學生社經背景與基本學力測驗分數之相關，雖然社經背景與學測成績有正相關，但也發現學生努力程度對基測的貢獻度高於社經背景。陳怡靖、陳蜜桃與黃毅志（2006）也以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分析發現，儘管低社經背景學生在聯考與直升中都居劣勢，但2000年由於實施實作評量，使得推甄不受社經背景影響，不過整體而言，教育機會受社經背景影響最明顯的是直升私立名校者，直升入學最符合多錢入學，宜深入研究。據此，本研究以私立名校為研究對象，研究旨趣不在於探析究竟社經背景或個人努力對於學業成就何者較有影響力，而是想瞭

解無論個人努力與否，貴族學校如何配合多元升學制度來生產菁英，其中是否存在社經背景主導入學機會之可能？

儘管目前的多元升學制度透過表面上客觀的各類考試與多元的評鑑機制來篩選學生，然而，當這種篩選制度以一種巨型認知機器（cognitive machine）執行著社會層級分化的工作，將社會的偏愛系統（preference system）逐漸形成眾人同意的認知視野（cognitive vision），以一種理所當然、無意識的方式再製了貴族階級的優勢地位（周平，2010），那麼，這無異是以貴族習尚來主導升學機會的制度，對許多家境不佳的學生來說則是一種升學不正義。這樣的升學不正義在學校中是如何形成、如何運作的呢？本研究將脈絡置於臺灣實施多元入學方案的政策下，分析一所中部貴族私立學校在招生管道與教學過程中，透過哪些文化再製策略來生產菁英，掌握升學。

貳、文獻探討

一、Bourdieu文化再製與菁英生產

Bourdieu（1974）透過對學術與文化不平等的分析，批評學校是個保守的暴力，個人出身不同家庭背景，透過父母傳送的知識訊息，直接或間接傳遞其階層的語言思想、價值觀、世界觀等文化財，經教化後，內化成該階層特有的「生存心態」，這反映出所屬階級的文化資本，傳遞到下一代，不同的生活模式和語言也都反映出階級的不同。而學校教師的教學語言亦是特殊場域的情境產物，受到場域內的價值性、合法性等原則來支配與控制，即所謂的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Bourdieu認為高等學校教育偏好上層階級的語言型態，無論生活、思想、行為、價值觀等模式皆為守護上層階級，等於是壟斷的世襲教育。考試選才不過就是淘汰低、下階層學生，保護中、上階層孩子，因此Bourdieu一再批判學校是文化再製的機構。